

---

# 1992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回顾\*

曾景忠

---

1992年抗日战争史研究继续有所进展。

1992年为“一二八”淞沪抗战60周年，“七七”卢沟桥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55周年。在这些抗战纪念日前后，上海、北京分别举行了学术讨论会。

这一年出版的有关中日关系史和抗战史的重要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等。抗日战争时期档案资料陆续发表出版。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下册）由档案出版社出版。《八路军史料丛书》（共8册，约500万字）编纂工作接近完成，陆续出版。一批抗日战争史专著、丛书正在组织编撰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丛书首批书年底已开始问世。

这一年发表的抗日战争史论文有200多篇，广泛探讨了各方面的课题。现将研究进展和一些重要观点作一概述。

## 一 日本侵华和沦陷区敌伪统治研究

一些论文对日本向中国东北殖民和日本侵华影响中国关内向东北正常移民的情况进行探讨。赵力群论述说：向东北移民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企图永久占有这块土地的最重要步骤。1927年

---

\* 本文系为《中国历史学年鉴·1993年》而作。

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要》，将奖励向中国移民，创建拓务省列为重要内容。“九一八”前试点移民，“九一八”后武装移民，集团移民，组织“青年义勇队”移民。1936年关东军司令部提出《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广田内阁将移民列入国策。至1945年止，向东北移民开拓团近千个，“开拓民”22万，“青年义勇队”10万。日本对移民进行招募培训奖励，并组织移入青年女子，以稳定向中国殖民。<sup>①</sup>朱玉湘、刘培平则论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反动统治和对关内移民的种种阻挠，中断了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正常进程，移民数量忽高忽低，流动性大，居住性减少，日本对关内移民的强制性掠夺性强。<sup>②</sup>

日本侵略军中的军妓制度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稣实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当其“慰安妇”的情况。侵华日军从九一八事变至日本投降14年间，在其占领的中国沦陷区内遍设慰安所，强迫妇女作慰安妇，受害人数以百万计，“其历时之久，方式之惨虐，实史乘前所未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认定日军犯有这种违反人道战争法规的罪行。<sup>③</sup>

车霁虹考察了伪满洲国颁布的《暂行保甲法》及其施行规则，该法由保甲制度、连坐规约、自卫团组织三部分内容组成，规定十户一牌，牌内一人“犯法”，全牌连坐，保甲内居民出入须经警察署批准，它是为镇压抗日反满活动，维持和巩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sup>④</sup>曾业英论述了日伪在沦陷区组织“新民会”“剿共灭党(国民党)”，“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等情况，说这个所谓民众团体，与其说它是“中华民国新民会”，不如说它是“大日本新民会”。新民会协助日本侵略者征服中国，把“精神工作”放在首位，又以青少年为主

① 《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2期。

② 《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③ 《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实录》，《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④ 《试论伪满保甲制度的殖民地特点》，《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要对象。<sup>①</sup>

## 二 抗日战争准备阶段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研究

陈先初研究论述国民政府从“安内攘外”政策向联共抗日政策转变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是将“剿共”当作抗日的前提，但“安内”不仅限于对共产党，还在于平息其内部冲突；对抗日也并非一无所为，而是有所作为的。从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到1935年夏，蒋介石强化“安内攘外”政策，压制其内部马上抗日的要求，但抗日准备工作也在秘密进行。1935年华北事变后，“安内攘外”政策发生动摇，向联共抗日政策转变，对日态度渐趋强硬，寻求同苏联和中共合作，加紧抗战的实际准备。因此，不能把“安内攘外”政策视为投降理论。<sup>②</sup>

金再及、余子道、张骏、马仲廉等对“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南京国民政府“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方针均进行了探讨。他们都认为，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方针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是不同的，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战是蔡廷锴等违抗南京政府命令的结果，那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仍是以抵抗求妥协，以交涉为主，以抵抗为辅，它比“绝对不抵抗”前进了一步，但从根本上说，依然属于不抵抗政策的范畴。<sup>③</sup>

有关对南京国民政府转向采取联共抗日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西安事变，张学继在研究中认为，地方实力派对事变有不同表态，

① 《略论日伪新民会》，《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② 《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向“联共抗日”政策的转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金再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余子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与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张骏：《南京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马仲廉：《淞沪抗战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但没有一个人明确支持张杨,而要求放蒋成为一致呼声。这是促成张学良仓卒放送蒋的因素。张学良“不留痕迹”的放蒋办法,是处置蒋介石的最佳选择,那种认为既要放蒋,又要保全张、杨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利益的看法是不现实的。西安事变的结果局证明了张、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设想是一个失策。<sup>①</sup>

在《团结报》“海外访史录”专栏连载中,杨天石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所藏陈立夫回忆中有关西安事变前后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档案中有关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与冯玉祥、张学良、李济深的来往电报,斯坦福大学所藏宋子文档案中有关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宋子文与孔祥熙、胡适、戴笠、张学良的关系与孔、胡矛盾情况,并有所分析。

### 三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事研究

这一年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诸役研究不多,一些论文论述到淞沪战役、南口战役、淮河阻击战等,以记述战役过程为多。余子道就南京统帅部发动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当时究否已经作出诱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的决策,与台湾学者商榷,他认为,当时大本营作战部并无此种战略意图。淞沪战场形成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的结果,也未使日本进攻方向改为由东向西,日本向西进攻武汉是在1938年5月徐州会战之后。<sup>②</sup>

对中国共产党抗日军事研究较有进展。石仲泉对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不同提法进行了考察。洛川会议上毛泽东的提法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其他有些领导人认为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紧密配合,在胜利把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集

<sup>①</sup> 《对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sup>②</sup> 《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

中兵力歼灭敌人,不应忽视运动战的作用,故有“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等提法,他认为不同的提法“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他根据档案资料揭示,在洛川会议前和会议后,毛泽东本人均使用过“运动游击战”的提法,也没有批评华北军分会1937年10月8日训令中“运动游击战”的提法。平型关获胜后,毛在布置游击战争的同时,对集中兵力作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至《论持久战》中提“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获得了全党普遍的拥护。<sup>①</sup>

徐成方分析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心理战的特点,1.中共心目中的心理战“是一场总体战”,“其实是争取人心向背,其手段不拘一格”;2.重点不是瓦解敌伪心理,而是“巩固优化自己内部的党心军心民心”;3.心理战“不仅是战术手段,还是一场精神革命”,“一改民族自卑压抑的精神状态”。他划分出中共开展两种类型的心理战:间接的,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坚持统一战线,反对分裂投降;直接的,为反击敌人治安强化运动、清乡运动,与敌伪争夺沦陷区的民心,直接瓦解敌伪军。<sup>②</sup>

闫树森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优待和改造日本战俘的情况作了考察。他论述说:中共制订了对日军俘虏予以优待不施侮辱尊重人格的政策,并指示对俘虏进行教育,争取其为我服务。优待战俘政策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许多日俘思想发生根本变化,战俘开展反战运动,日军中反战厌战情绪日炽。中共创造了战俘改造学校的特殊形式。改造好的战俘学员可参加政治活动,有些当选为各级议员,参与政府工作。日本法西斯感到这是一场对日军的“无形战争”。中共改造日俘是“世界战俘改造史上的一个奇观”。<sup>③</sup>

① 《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抗日战略方针思想的提出和发展过程》,《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

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心理战初探》,《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③ 《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本战俘的改造与中国共产党人权保障政策》,《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高乐才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原来的土匪武装参加抗日战争的情况:东北地区绝大多数土匪激于民族义愤,放弃土匪生涯,投入抗战行列。其参加抗日者6万余人,占东北各阶层抗日武装总人数30万的20%。他们枪马娴熟,作战勇猛,参加战斗千次,歼日军一万余,伪军三万余。其中相当一部分接受共产党领导,加入抗日游击队,也有一部分匪性不改,被拉拢收买,投敌叛变。<sup>①</sup>

#### 四 抗战时期的民众抗日活动研究

一些论文对民众抗日活动关注。袁林述及云南各族人民支持抗战的活动:彝族、哈尼族人民踊跃购买救国公债,捐款捐物,缴纳军粮。在认购飞机的活动中,丽江纳西族、傈僳族、藏族、普米族人民共出半开银(每枚合“大头”五角)65000元。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云南分会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白族学生演出救亡戏剧开展宣传。<sup>②</sup>

徐鲁航论及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情况:七七事变前台胞抗日斗争重心在台湾岛内,“七七”后日本在台湾实行战时体制,军警严密控制,岛内只有小规模暴动,和抵制“皇民化”的运动,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困难。争取台湾解放的志士潜往大陆,与大陆台胞汇合,开展武装抗日斗争,组织抗日团体(最大的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参加大陆抗日军队,出版抗日复台的《新台湾》、《台湾民声报》。台胞抗日活动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一部分,为推进收复台湾,其功不可没。<sup>③</sup>

乔培华论述了豫北农民团体天门会先受日本伪化、后被共产党利用暗中支持抗日的情况:豫北浚县、滑县、汤阴一带有农民自

①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土匪抗日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

② 《云南各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③ 《七七事变后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几个特点》,《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发的抗匪保家自卫团体天门会,1938年春会首杨贯一率领几十个村的会众抗击前来抢粮的日伪军。日军采取怀柔手段,允其建立常备武装,天门会伪化。冀鲁豫军区、中共卫西工委争取会首杨贯一,派共产党员打入天门会,使之成为外圆内方皮白心红的灰色组织,帮助建立地下交通线和共产党武装,利用合法机会间隙打击日军。<sup>①</sup>

## 五 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研究

一些学者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生活政治制度进行探讨,有所深化。杨群分析了抗战前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趋势:抗战爆发后国内出现多党合作团结统一的局面,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战时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发表政见的场所,对政治决策具有讨论权与议决权,标志着政治决策开始朝着制度化方向迈进。国民党政权有所开放,国民党对舆论的控制有较大放松,新闻出版有了一定的自由,政治透明度增大,人们议政参政渠道得到拓展。<sup>②</sup>关志钢论述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与抗战前不同:强调为抗战服务,蒋介石对“礼义廉耻”作了符合抗战需要的解释,各项工作围绕抗战展开。其主要贡献为:开展节约献金运动,为前线官兵提供各种战时服务,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其消极面是,积极配合蒋介石集团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进行反共宣传。<sup>③</sup>

陈廷湘考察了国民党建立和强化战时政制的情况:国民党战时集权政治体制从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建构,日趋集中化和一体化,自上(领袖)而下(乡保甲)权力纵向一体化,党政群等

① 《日军对天门会的怀柔政策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抗战前期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趋势》,《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

③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

权力横向一体化。为加强集权政制，国民党加强了对中间组织的控制，并设置参政会参议会以加强其权威性，强化思想统一以取得人民对集权体制的认同。国民党还推进权力运行制度化，健全现代科层政权组织，制订行政法规，实行考铨考绩制度，划清机关和官员的权责，实行“行政三联制”，推行监察办法。但是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局限，国民党始终把异己的政治力量排斥于真正的权力圈之外，日益强化个人独裁，建立清一色的蒋系国民党一党专政，保留大量特权原则，牺牲制度的效能和权威性，终使政权本身日益腐败涣散。<sup>①</sup> 靳德行、翁有为考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政府体制：其层级结构为三级（边区、县、乡）三辅（行署、专署、区署）制或二级二辅（无行署）制；其组织构成，主要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参议会是各级政权的权力机关，各级政府是同级政权的权力执行机关。司法工作是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审级是三级三审制或三级二审制。<sup>②</sup>

国共两党关系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的核心内容。一些学者对此亦提出了新的认识。刘大年认为：“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统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对立斗争并没有结束”，但“这时的矛盾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意识领域，主要不表现在武装对峙上，中国抗战的阵营能够坚持和运转，这是关键的一环”。国共严重的对立斗争何以没有导致抗日阵营的分裂呢？这是因为：“蒋介石主观上是抗日反共并重，甚至反共重于抗日”，但“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在双方矛盾斗争中，共产党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节”就是不要让抗日战争这个全局遭到危害。<sup>③</sup> 唐培吉、张劲认为：过去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纲领，“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们认为：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①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政制建设》，《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② 《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体制初探》，《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③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与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比，“从中可见国共两党所提纲领在主要原则和精神以至用词上的共同处”，“两党都能够承认三民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以此为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联名提交《拥护政府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案》，表明中共对《抗战建国纲领》的赞成和支持。“不妨将两党再次合作的共同纲领概括为‘抗日救国’的三民主义”。毛泽东也说过，在抗战时期，这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sup>①</sup>

关于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最严重的一次磨擦皖南事变，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研究，尚有不少意见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发表了《李一氓谈皖南事变与项英》一文（李当年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秘书长），其中论及：在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放弃皖南时，项英并未表示拒绝，讲项英反对北移是没有根据的；在北移路线问题上，项英在军事上的责任比政治上的责任大得多。早走两三天也许就能冲过去了，国民党包围圈合拢了，冲不出去，项英就无主张了。说项英受王明的影响很大是不公平的，他与王明毫无关系，他对保持党和军队的独立性态度是坚决的。中央作出《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距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其中最后一条讲要提交“七大”讨论，但其后“七大”和历次党代大会均未涉及，项英问题没有最后解决。王辅一也认为，“不应把皖南失败的主观责任归于项英一人”。当时中共中央指导上，“对形势分析不准确”，“要求一变再变”，开始叫再拖一两个月，“对国民党过于信任和迁就”，决策是有失误的。<sup>②</sup>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国民党作全面大反攻，但后来改变方针，确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刘以顺分析，这是由于听取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同时共

① 《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纲领试论》，《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

② 《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产国际也不同意中共破裂国共关系。<sup>①</sup>

## 六 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文化研究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经济文化方面比较薄弱,尤其文化思想方面几乎是空白。这一年对文化的研究多少有些进展,对经济研究甚少。

有关经济方面,对很少有人研究的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张国镛就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纳尔逊(来华帮助战时生产)来华史实和战时生产局成立日期作了一些考订。<sup>②</sup>温锐考察晋察冀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后,地主旧式富农占有土地绝对地减少,农村阶级结构变化(地主阶级削弱,中农贫苦农民阶级地位上升)等情况,认为那里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大大削弱或趋于消灭”,与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无两样,却可避免平分土地的消极影响,有利农村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sup>③</sup>

关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些专题论文。有的论述抗战时期适应生产自救的需要,延安中共领导人重视科学技术,提倡自然科学,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开展自然科学运动等情况。有的论述抗战时期出现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热潮:文学翻译刊物数量空前之多,翻译热点从日本转向西方,由兼译变为专译,现代流派文学传播、翻译西方古典名著和推荐苏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形成文学翻译界鼎足三分局面。有的论述因沿海大城市沦陷,东南地区原来文化落后偏僻的金华(浙江),永安(福建),上饶、赣州(江

① 《皖南事变后中共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方针的确定》,《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1期。

② 《关于中国战时生产局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③ 《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方式》,《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

西)形成战时文艺中心,形成作家群,催促着东南文艺运动。<sup>①</sup>有两篇论文专门论述抗战时期广东香港地区的文化活动状况。袁小伦叙述了抗战初期中期中共在广州、曲江、香港等地建立文化阵地,创办报刊,开展抗战宣传,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文化宣传工作等情况。<sup>②</sup>黄增章专门论述了广州武汉沦陷后,香港中文刊物空前繁荣情况:华中华南一些出版机构和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建立文化堡垒,国民党为向海外宣传也派人到港办刊,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组织一批进步文化人撤往香港。香港中文刊物大发展,数量繁多,种类齐全,《大众生活》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是香港刊物之杰出代表。中文刊物繁荣,给香港人灌输了民族忧患意识御侮救亡观念,推动了香港文化事业的发展。<sup>③</sup>

## 七 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

1992年对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研究涉及中国与一些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和抗战时期形成的中国大国地位问题。

汪熙分析抗战时期中日“和谈”情况:中日各有企图,中国想通过谈判缓和日军凌厉的攻势,牵制日方,并将谈判作为要挟英美提供更多援助的筹码。日本想通过谈判从中国泥潭中脱身,抽出兵力对苏或南进,不战而胜占领中国,压汪精卫就范。因战争和国际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日方的条件变化幅度比中国更大。国民政府总是守住“领土主权”这条底线,更多地是把谈判当作“兵不厌诈”的策略。重光葵认为无论是汪伪政权成立前还是它成立后,日

① 周训芳:《延安时期党的科技政策与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科学运动》,《求索》1992年第6期;程麻:《抗战文苑中的文学翻译之花》,《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王嘉良:《战时东南文艺研究》,《浙江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② 《中国共产党与香港抗战文化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③ 《抗战时期香港的中文刊物》,《中山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本整个和谈工作都是失败的,这一评断合乎事实。<sup>①</sup>李广起运用德文资料论证陶德曼调停基于德国自身利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德国即建议中日两国“克制一些”。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不符合德国利益。德中紧密的贸易伙伴关系决定了两国间的政治关系,两国还实行军事合作。德国担心中日战争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希望早日和平解决。希特勒调停的目的是使中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使日本承担尊重所有外国在华利益的义务。<sup>②</sup>胡德坤论证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于日德关系的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是与德国结盟,以互相配合,但因中国抗日战争使日本陷于持久战的泥潭不能跟上德国步伐,导致日本对德关系处于被动消极状态,这影响了日德互相配合,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步伐。<sup>③</sup>

李建高考察了1937年8月—1940年9月,法国从肖当政权到达拉第一雷诺政权,到贝当—赖伐尔维希政府,向日本妥协,对中国假道越南输入物资过境时加禁运,直到最后全面停止过境,结果助长了日本侵略野心,增添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困难,法国在远东的地位和殖民利益亦被葬送的情况。<sup>④</sup>

针对《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载孔庆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略》一文所述,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借款8笔,总额为55638.58万美元的说法,李嘉谷详加考核,指出其有重复计算等错误,认为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只在1938—1939年先后有三次易货贷款支援中国,总数为2.5亿美元。后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对华第三次易货贷款的使用中断,故抗战新期间实际动用苏联借款共1.73亿美元。<sup>⑤</sup>

王建朗考察了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由对中日双方持中立

① 《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

② 《1937年底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利益所在》,《南开学报》1992年第3期。

③ 《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对德关系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④ 《抗战时期在假道越南运输问题上法国政策的演变》,《求索》1992年第2期。

⑤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贷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政策,到对日实行“道义禁运”,购买中国白银支持中国财政,及至罗斯福批准桐油贷款计划的过程,指出:援华制日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发展方向,1938年在美国对华政策发展过程中,是起步之年。<sup>①</sup>

刘存宽考察了日本投降时英国重新占领香港,并且抢夺对香港日军的受降权,排斥中国,发生了中英受降之争的情况,认为中国有理受辱,英国无功受益,除了英国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的原因外,还因为美国支持英国,国民政府缺乏自强自立精神,实行“反共优先”政策。<sup>②</sup>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国外国内均有贬低中国,认为中国不配作大国的看法。李铁城分析说,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卓越贡献,领衔发表联合国宣言,共同发起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的大国地位是当之无愧理所应得的。美苏英承认中国大国地位无非是承认一个历史事实。中国为联合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在许多方面提出重要建议被采纳,作为东方国家代表,尽力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平等,种族平等,强调国家主权和独立。<sup>③</sup>

## 八 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遗留问题亦引起了抗战史研究者的关注。1992年探讨了以下三个战争遗留问题:

(一)残留山西日军。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与山西侵华日军头目勾结,组织部分日军残留山西,1946年组编残留日军为6个特务团,1947年夏改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加上担任其他职务的日

① 《艰难的起步:1938年美国对华政策透视》,《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② 《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③ 《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军人员共 5000 人。残留日军参加阎锡山军队对解放军作战(汾孝之战、阳泉之战、晋中之战、太原之战),与阎锡山政权同归失败覆灭。<sup>①</sup>

(二)战争期间中国损失调查。对战争中我国所遭受的生命财产损失的调查,战争期间即已开始,南京国际赈济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Smythe)调查南京地区,行政院通令中央各机关和各地政府调查,成立过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湖北、桂南作过局部调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作过抗战损失研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调查,由赔偿委员会主管。至 1946 年已有主要损失统计数字,但无完整统计数字。后因内战调查中止。论者提出,寄希望于海峡两岸识者“同心协力,将这有益于我民族的工作进行到底”。<sup>②</sup>

(三)调查追偿日本劫夺的中国文物。日本在我国沦陷区掠夺大量图书文物艺术品。国民政府对追索被劫文物十分关切,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进行调查追偿工作。战后追回了部分文物,但有大量未能追回,原因是:1.盟军总部对收回文物规定甚严,株守验视物证办法,而物权证件因战事多为遗失,因而追回文物困难;2.日本配合调查多系敷衍了事;3.美国转而扶植日本,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sup>③</sup>

回顾 1992 年抗日战争史研究,从一些成果可以看出,领域在拓宽,视角在求新,探索在深化,这是可喜的。但从总的情况观察,研究尚不平衡,除了研究水平和深度存有轩轻外,不少研究领域,如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方面还很薄弱,甚至有许多是空白,亟待加强。即使过去研究者涉猎较多的政治、军事方面,研究也并非都是详尽深入的。研究资料有待挖掘刊布编纂出版,有些习见

① 叶昌纲:《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

② 孟国祥、张庆军:《抗战期间中国损失调查述要》,《民国春秋》1992 年第 6 期。

③ 孟国祥:《调查和追索日本劫夺我国文物工作述要》,《民国档案》1992 年第 4 期。

但并不符合史实的认识须要澄清,许多问题须要作多角度的考察,在深入开掘中得出新的见解。抗日战争史研究大有可为,寄望有志于此者奋力开拓耕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www.cnki.net